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郭英德 / 主编

张德建 / 执行主编

斯文

第一辑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敘時序一敘群賢二敘修禊三敘流觴四敘曲水五敘列敘時序六敘群賢七敘修禊八敘流觴九敘曲水十敘列敘時序十一敘群賢十二敘修禊十三敘流觴十四敘曲水十五敘列敘時序十六敘群賢十七敘修禊十八敘流觴十九敘曲水二十敘列敘時序二十一敘群賢二十二敘修禊二十三敘流觴二十四敘曲水二十五敘列敘時序二十六敘群賢二十七敘修禊二十八敘流觴二十九敘曲水三十敘列敘時序三十一敘群賢三十二敘修禊三十三敘流觴三十四敘曲水三十五敘列敘時序三十六敘群賢三十七敘修禊三十八敘流觴三十九敘曲水四十敘列敘時序四十一敘群賢四十二敘修禊四十三敘流觴四十四敘曲水四十五敘列敘時序四十六敘群賢四十七敘修禊四十八敘流觴四十九敘曲水五十敘列敘時序五十一敘群賢五十二敘修禊五十三敘流觴五十四敘曲水五十五敘列敘時序五十六敘群賢五十七敘修禊五十八敘流觴五十九敘曲水六十敘列敘時序六十一敘群賢六十二敘修禊六十三敘流觴六十四敘曲水六十五敘列敘時序六十六敘群賢六十七敘修禊六十八敘流觴六十九敘曲水七十敘列敘時序七十一敘群賢七十二敘修禊七十三敘流觴七十四敘曲水七十五敘列敘時序七十六敘群賢七十七敘修禊七十八敘流觴七十九敘曲水八十敘列敘時序八十一敘群賢八十二敘修禊八十三敘流觴八十四敘曲水八十五敘列敘時序八十六敘群賢八十七敘修禊八十八敘流觴八十九敘曲水九十敘列敘時序九十一敘群賢九十二敘修禊九十三敘流觴九十四敘曲水九十五敘列敘時序九十六敘群賢九十七敘修禊九十八敘流觴九十九敘曲水一百敘列敘時序

斯文

第一辑



中国 古代 散文 学会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

主办

郭英德 / 主编

张德建 / 执行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文. 第一辑 / 郭英德主编. -- 北京 :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17.9

ISBN 978 - 7 - 5201 - 1348 - 9

I. ①斯… II. ①郭… III. ①古典散文 - 古典文学研
究 - 中国 - 文集 IV. ①I207.6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0917 号

斯 文 (第一辑)

主 编 / 郭英德
执行主编 / 张德建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吴 超
责任编辑 / 吴 超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55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1348 - 9
定 价 / 9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编委会

主 编 郭英德

执行主编 张德建

名誉主编 谭家健 熊礼江

副主编 王达敏 欧明俊

编委会 曹 虹 常 森 过常宝 韩高年 洪本健

侯体健 李小龙 刘成国 刘 宁 刘全志

刘尊举 马东瑶 马茂军 马自力 莫道才

阮 忠 谢飘云 谢 琰 叶 晔 余来明

张新科 钟 涛 吴 微

发刊词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走过百年历程，取得丰硕成果。然而不同文体研究的发展状况却并不平衡。相对于中国古代诗歌、戏曲、小说的研究，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至今仍不尽如人意。其中最重要的制约因素在于：中国古代散文最难与世界文学产生对话——其内涵、功能、类型、写法、美感，都有极为独特的表现形式，却与西方“散文（prose）”，甚至“文学（literature）”概念参差扞格，难以合榫。因此，中国散文概念长期处于古今分裂、中西隔阂的认识之中，且学术界始终无法对此进行有效的界定与确认。

一方面，概念的莫衷一是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代散文的研究，使得许多学术研究者往往并不在同一层面进行对话，研究成果缺乏学术积累的意义，而维系散文研究的一些重大命题则乏人问津或各说各话。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散文在其他文类的研究中虽然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古代的诗歌、小说、戏曲的研究总离不开中国古代散文的支援，但许多研究者往往把中国古代散文作为研究的资料而非研究的对象，这不但对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是一种漠视，而且在更深的层次上也限制了其他文类的研究。

事实上，中国古代散文有着极为独特的意义，从上古延续到晚清，构成一座内涵丰富、数量庞大、亟待挖掘的学术宝库。在历史的长河中，从经世济民、思想创造、传递情感，到描写社会、塑造历史、表现社会习俗，等等，散文承担着其他文类无以取代的作用。从文献分类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经、史、子、集四部文献都以散文文体作为其核心的撰述方式，这就形成了一个以经为源头，史、子分头并进，集部蔚为大观的散文世界。

由此可见，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中国古代散文”不能仅限于那些抒情写景的所谓“文学散文”，“而是要将政论、史论、传记、墓志以及各

体论说杂文统统包罗在内，不仅如此，而且连那骈文辞赋也都包括在内”（郭预衡《中国散文史·序言》）；也不能仅限于集部之文，还应包容经部、史部、子部乃至释藏、道藏之文。这种广义的“散文”观念，超越了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散文”的内涵与外延的纷繁歧异的辨析，更为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面貌。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突破，首先就要在概念上摆脱西方语境中的“散文（prose）”或“文学（literature）”的桎梏，重新回归中华文化传统，让散文真正地彰显“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本体特性，发扬“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化功能，重现元气淋漓的“斯文”世界。

毋庸置疑，散文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载体，具有深厚而多维的精神内涵，丰富而普适的表达方式，以及精雅而绚烂的审美特征。今天，当我们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它作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的时候，只有开拓这样的“大散文”视野，才能有效地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

在中华文化研究与传播学科交叉平台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协同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创办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专刊——《斯文》。我们希望《斯文》能够搭建一个好的学术平台，联络有志之士，“列叙时人，录其所述”，不断地奉献一批又一批丰富而厚实的述作，积极推进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深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阐发其中蕴藏的哲学思想、伦理观念、价值追求和审美精神，延续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继往圣之绝学，开文化之新面。

“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目 录

特约专稿

《四库全书总目》与中华学术体系的构建 郭英德 / 3

唐宋赠序文风演变论

——以韩欧等唐宋大家作品为例 熊礼汇 / 16

大视野

陆贾文艺思想论 张峰屹 / 43

刘知几《史通》的文章观 阮 忠 / 53

科举学视野下明代散文史研究的重新思考

——以“唐宋派”为对象 余来明 / 73

散文研究文献考述

史家文心亦精微

——章学诚文论的特色及其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略论 石明庆 / 91

从文法到士大夫意识：叶燮《汪文摘谬》的批评

方式论析 诸雨辰 / 118

清代文话的成书、范围与文派流衍 蔡德龙 / 135

《清代文话研究》序 曹 虹 / 149

文体研究

人文思潮的复兴与汉末诸子政论文嬗变

——兼论古代散文研究的一种思路 李晓敏 / 153

礼乐雅颂与政治讽喻

——晚唐五代古文创作之文学观念的文化学考察 李伟 / 171

台阁文学中的同题写作与文学权力场域 张德建 / 190

解构经学与晚明文章的小品化 欧明俊 / 210

作家研究

从“古文”到“古文辞”：姚鼐的文体自觉与文体融通 吴微 / 231

思兼单复与汉魏文风：王闾运骈文综论 吕双伟 / 244

文献考辨

孔子“出妻”说及相关问题辨析 刘全志 / 265

王安石的书启编年与交游网络考 刘成国 / 288

桐城派学者李诚先生年谱初编（1906~1949年） 王达敏 / 301

书评与综述

朴实的作品分析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创新之本

——重读聂石樵先生《唐代文学史》 谢琰 / 317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世代

——以宋代文学为中心 [日]内山精也著 潘超译 / 328

特约专稿

《四库全书总目》与中华学术体系的构建*

郭英德**

摘要：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逐渐构建了一套相对完善的体系，这套学术体系可以从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体系中看出。图书分类在现象层面是一种文化知识体系的构建方式，在本质层面则是一种学术体系的构建方式。《四库全书总目》以集大成的方式，彰显了中华传统的学术体系。这一学术体系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和极其鲜明的特色，足以为我们今天重新建构中华学术体系提供有益的文化启示。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 图书分类 学术体系

—

当今我们重新构建中华学术体系，不能不深刻地省思和广泛地汲取延绵两千多年的中华学术文化传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逐渐构建了一套相对完善的体系，这套学术体系借助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体系得以彰显。

* 本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基金项目“历代文学经典的传承与中华人文精神的塑造”（项目号 SKZZB2015030）的资助。

** 郭英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体系中，无论是两汉之交刘向（前 77 ~ 前 6 年）、刘歆（前 50 ~ 23 年）父子的六部分类（即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还是六朝以降的四部分类（即经、史、子、集），都根源于古人对传承久远的文化知识体系的基本认识和抽象归纳。易言之，图书分类在现象层面是一种文化知识体系的构建方式，在本质层面则是一种学术体系的构建方式。南宋郑樵（1104 ~ 1162 年）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① 学术体系正是在“先后本末”的图书分类中得以鲜明地体现的。清人章学诚（1738 ~ 1801 年）说：“（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② 由于刘向父子“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因此可以对历代的图书加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形成“部次条别”的图书分类，借以构建一整套相对完善的学术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入考察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观念和图书分类方式，深入考察具体体现这种观念和方式的目录学著作，从而揭示其中的学术理念和学术方法，无疑是深刻领悟中华学术体系的“不二法门”，也是重新构建中华学术体系的必由之路。

刘向、刘歆父子致力于整理古今载籍，部次条别，大约在汉哀帝建平元年（前 6 年），撰成目录学著作《七略》。据记载，欧洲第一个正式的图书分类表即瑞士人吉士纳（Konard Nesner）编撰的《万象图书分类法》（*Bibliotheca Universals*），成书于 1545 年，《七略》的成书比它要早 1551 年。《七略》一书已经亡佚，我们现在只能根据东汉班固（32 ~ 92 年）《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大体上还原它的分类原貌。《七略》含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即六个学术领域，在目录学史上习称“六分法”。《七略》的六分法是以“义”即书籍的内容性质作为分类标准的，因此带有鲜明的学术分类性质。其中“六艺”属于王官之学，“诸子”属于私门之学，而“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则属于专门之学，这六个学术领域的构成及其先后排序，体现中华学术体系在先秦至两汉这一时期的基本面貌。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华学术体系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华学术体系在保持原有的整体格局的基础上，出现了三个重要的演进

① 郑樵：《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通志》卷七一，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第 831 页。

② 章学诚：《校雠通义叙》，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卷首，第 945 页。

趋势。

第一，史学崛起而起，与经学并驾齐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从“六艺”中二级分类的《春秋》之学的附庸，逐渐蔚为大国，其质量和数量呈现“滚雪球式”的效应，从而得以独立成类，跃升为中华学术体系中的一级分类。南朝梁阮孝绪（479~536年）指出：刘向、刘歆时代“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故而必须另立一类^①。而且，历史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越来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以致从东晋时期开始，历史学就超越诸子学，占据中华学术体系的第二把交椅。因此，东晋著作郎李充（约300~约360年）整理典籍，就以“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②，确定了后世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次序，“自尔因循，无所变革”^③。在四部分类中，史部实际上成为专门性质最为显著的一个部类。

第二，两汉以降，先秦诸子之学在总体上呈现衰微趋势，且越来越难以独立成类。于是，在魏郑默（213~280年）《中经》和西晋荀勖（？~289年）《中经新簿》中，“古诸子学”从“六分法”中的一级分类下降为“四分法”中的二级分类，成为兼容“兵书”“术数”“方技”等专门之学的类型，构成内容庞杂的“乙部”。到东晋李充整理典籍时，又进一步被调整为位置次于史部图书的“丙部”，成为后世的“子部”的典型。“子部”的出现、定位与演进，表征着中华学术体系的一次重大变革，意义极其深远。

第三，东汉末年，文集日兴，尤其是“众家之集，日以滋广”^④。这时仍旧以“诗赋”之名概称所有的“文章”著述，便显得名不副实^⑤。于是，在魏郑默《中经》和晋荀勖《中经新簿》中就将“诗赋”类改称为“丁部”，南朝刘宋王俭（452~489年）《七志》改称为“文翰”，南朝梁阮孝绪《七录》又改称为“文集”，至唐初魏徵（580~643年）等编纂《隋

① 阮孝绪：《七录序》，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三，《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汪道昆刻本），商务印书馆，1919。

② 萧统：《文选》卷四六，《王文宪集序》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中华书局影印本，1977，第654页。

③ 魏徵等：《经籍志·序》，《隋书》卷三二，中华书局，1973，第906页。

④ 魏徵等：《经籍志·集四》，《隋书》卷三五，第1089页。

⑤ 关于两汉时期“文章”一词含义的演变，参见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50~52页。

书·经籍志》，最终定名为“集部”。

以上三个重要的演进趋势，到唐初《隋书·经籍志》确定四部分类时基本完成并定型，奠定了此后1400多年构建中华学术体系的基本范式，并成为清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时最为重要，也最为直接的学术资源。

二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库全书总目》写定，并由武英殿刊刻发行。该书“卷帙浩博，为亘古所无”，“自有典籍以来，无如斯之博且精矣”^①。《四库全书总目》一方面仍然采用流传1200余年的图书四部分类法，“务求典据，非事更张”^②；另一方面对四部分类法加以模式化和细致化，终于构建了一个集大成式的中华学术体系，体现一些极其鲜明的文化特色。

在《四库全书总目》所体现的中华学术体系特色中，有两个重要的特色最值得注意：一是经部的沿袭与新变，二是子部的分合与演进。

首先看“经部”的沿袭与新变。

从刘向父子的“六艺”类，到《中经》《中经新簿》的“甲部”，再到东晋南朝目录中的“五经”、“经典志”或“经典录”，最后到唐初《隋书·经籍志》定名为“经部”，这一学术类别在整体上几乎历代相沿不变。近代文献学家余嘉锡（1884~1955年）指出：“盖历代惟经学著述极富，未尝中辍，旧书虽亡，新制复作，故惟此一部，古今无大变更。”^③而且再进一步细审，在历代“经部”目录的二级分类中，《易》《书》《诗》《礼》《乐》《春秋》这六类的分类及其排序总是一以贯之的^④，它充分体现中华学术体系的传承性和稳定性，即从两汉以降，中华学术体系始终以经学为基础知识和核心价值，历千年而无渝。

当然，相比较而言，经学在两宋以后也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即在二级目录中确立“四书类”，标志着理学（或道学）从元代以降已经成为经

① 纪昀等：《凡例》，《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第16~17页。

② 纪昀等：《凡例》，《四库全书总目》，第17页。

③ 余嘉锡：《目录类例之沿革》，《目录学发微》卷四，巴蜀书社，1991，第136页。

④ 《乐》书在《四库全书总目》中置于“四书类”之后、“小学类”之前，是为变例，可略而不论。

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书”原本各自单行于世，其合称并行始于宋代，并且成为理学的重要载体。《宋史·道学传·序论》说：“（程颢、程颐）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按，指《中庸》），下至初学入德之门（按，指《大学》），融会贯通，无复余蕴。”^①《宋史·程颐传》也说：程颐（1033~1107年）“其学本于诚，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②南宋大儒朱熹（1130~1200年）认为：“《四子》，《六经》之阶梯。”^③他穷数十年精力研治“四书”，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在福建漳州刊刻亲自注释的《四书集注》，“四书”的名称从此确立。从此以后，“四书”风行天下，尤其是在元延祐二年（1315）列入科举科目以后，“四书”成为读书人必读的“经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五经”在教育领域的崇高地位。这就使程朱理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跻身为官方学术，确立了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并一直延续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总结了这一学术趋向，因此在“经部”明列“四书类”，标志了程朱理学在经学中处于重要的地位。

其次看“子部”的分合与演进。

从西晋的《中经》到唐初的《隋书·经籍志》，虽然已经初步建构了中国图书分类体系的“四分法”，但是这一“四分法”却并不完善，无法涵容全部的中华学术文化内容。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始终未能将佛教与道教的典籍纳入“四部”范畴之内。

南朝梁阮孝绪编纂《七录》，将先秦两汉以来历代传承的学术体系分为五类，即经典、记传、子兵、文集、术技，是为“内篇”；而将两汉以后衍生的学术图书，单列出“仙道录”与“佛法录”二类，是为“外篇”。这种内、外之分，已经明显地表征传统的中华学术体系出现了裂痕。唐初编《隋书·经籍志》，未能补罅这一裂痕，而只是在“四部”分类之外，以“附录”的方式，收纳“道经部”和“佛经部”两类。但是，《隋书·经籍志》对这两类图书仅统计种数、部数、卷数，而未细列书名，可以看出目录编纂者对这两类图书的存在价值和隶属关系尚存犹疑。

这种犹疑，引而申之，揭示从魏郑默《中经》、西晋荀勖《中经新簿》

① 脱脱等：《道学传·序论》，《宋史》卷四二七，中华书局，1977，第12710页。

② 脱脱等：《程颐传》，《宋史》卷四二七，第12720页。

③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〇五，中华书局，1986，第2629页。

之后，历代目录学家对“诸子”一类图书内容性质的思考与探索。正如余嘉锡所精辟指出的：“合而观之，七略之变而为四部，不过因史传之加多而分之于《春秋》，因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之渐少而合之为一部，出数术、方技则为五，益之以佛、道则为七，还数术、方技则为六，并佛道则复为四，分合之故，大抵在诸子一部。互相祖述，各有因革。虽似歧出枝分，实则同条共贯也。”^①

五代修《旧唐书》，在其《经籍志》中将道、释二类图书分别置于“乙部”和“丙部”，在“乙部”“史录·杂传类”中收仙灵 26 家，高僧 10 家；“丙部”“子录·道家类”中收道、释著说 47 家。宋初修《新唐书》，在其《艺文志》中稍加改动，将此二类图书均置于“丙部”，在“子录·道家类”中收神仙 35 家 50 部，释氏 25 家 40 部，另有不著录者若干家。在中国古籍目录史上，这两部目录著作率先将道、释图书归并入“史部”或“子部”，为传统的道家所收容，从而成就了真正的“四部”目录。但是，道、释二家的著作性质与传统的道家迥然有异，如此归类，难免后人“颇乖名实”^② 的批评。

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编成国家书目《崇文总目》，第一次将道、释图书列入“子部”，并独立成类，单列为二级目录，标目为“道书类”“释书类”。南宋初郑樵称道：“《崇文总目》，众手为之。其间有两类极有条理，古人不及，后来无以复加也。”^③ 其中一类指的就是“道书类”。此后，晁公武（约 1104 ~ 约 1183 年）《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约 1186 ~ 约 1262 年）《直斋书录解題》、马端临（1254 ~ 1323 年）《文献通考·经籍考》等都承袭了这一做法。

至于南宋尤袤（1127 ~ 1194 年）《遂初堂书目》、清官修《明史·艺文志》等，则仅在“子部”设置“释家”一类，而仍将道书附属于“道家”类。这是因为，在宋元以后，一方面，道家思想与道教思想、神仙家思想出现了逐步融合的趋向；另一方面，民间的道教著作又被排斥于书目著录之外。《四库全书总目》虽然将“道家”和“释家”同等地视为“别教”“外学”^④，但是仍然延续《明史·艺文志》的做法，对道书与释氏图书的

① 余嘉锡：《目录类例之沿革》，《目录学发微》卷四，第 148 页。

② 纪昀等：《释家类序》，《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五，第 1236 页。

③ 郑樵：《校讎略·崇文明于两类论》，《通志》卷七一，第 834 页。

④ 纪昀等：《子部总叙》，《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一，第 769 页。

性质严加区别，在“子部”独立设置“释家”一类，而将道书附属于“道家”类。这种图书分类法体现中华学术体系对“内学”与“外学”的严格区分：道书溯源于道家，是道家在后世民间滋生的学术，因此原本隶属中华学术体系，是谓“内学”；而以佛经为载体的释家，则来自于印度，是外来学说，原本不属于中华学术体系，是谓“外学”。明人陈建（1497~1567年）信守程朱理学正统，甚至极而言之：“禅、佛之祸，以异学而乱吾中国圣贤之学。”^①

但是，最值得称道，当然也最值得质疑的，恰恰是《四库全书总目》在“子部”中独立设置“释家”一类所体现的学术理念和学术方法。它一方面固然体现了中华学术体系的传承性和稳定性不容轻易打破，从一个侧面展现中华学术体系的保守性或者顽固性；另一方面，它也彰显中华学术体系的包容性和适应性，足以容纳古所未有的学术文化内容。

“经部”的沿袭与新变和“子部”的分合与演进，极其鲜明地体现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的文化特色，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三

综上所述，《四库全书总目》以集大成的方式，彰显了中华传统的学术体系。这一学术体系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和极其鲜明的特色，足以为我们今天重新建构中华学术体系提供有益的文化启示。这种文化启示，超越了“四部分类”的图书分类现象，揭示一些发人深思的学术传统和学术智慧。

第一，在以图书分类为表征的中华学术体系中，“经部”始终居于诸部之首，历千百年而不变。“经部”的原典当然是亘古不变的，《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说：“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而历代图书目录中“经部”所收图书，无非“诂经之说而已”^②。这些图书无疑都是两汉至清代学者的撰述，就其撰述行为而言，同“史书”、“子书”和“集部”图书似乎没有本质的区别，真正的区别在于“诂经之说”的撰述对象是原典，撰述主旨是“诂经”，即阐释经书的内涵、价值、功能与意义。正是这种撰述对象和撰述主旨，赋予“诂经之说”的

^① 陈建：《学菴通辨·续编》卷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册，影印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刻本，第101页。

^② 纪昀等：《经部总叙》，《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第1页。